

浅析清3部《畿辅通志》“星野”的因袭与创新*

吕书额

提要：清代3部分别成书于康熙、雍正、光绪年间的《畿辅通志》使“畿辅”地区的通志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见证清代方志学的兴盛，其本身也各具特色，是方志学理论研究和现代方志编纂工作中的重要参考文献。3部《畿辅通志》中，常见于中国旧方志的“星野”在编排位序、内容撰述与观点表达等方面，后者于前者有因袭，也有创新。由此引发的思考能帮助我们深化对志书的认识与评价，也可略窥传统中国史地认知、哲学观念的演变。

关键词：《畿辅通志》 星野 因袭 创新

有清一代3部《畿辅通志》，是我们今天了解京津冀地区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成书于光绪年间的《畿辅通志》更有“方志巨擘”之誉。目前学界对其虽已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但总体上仍处于研究的原始积累阶段。^①笔者在此不揣浅陋，试就其中“星野”篇的因袭与创新做一探讨。

“星野”是中国旧方志中的常见篇章，因袭与创新也是方志编纂中老生常谈、但又常谈常新的一个话题。纵观分别成书于康熙、雍正和光绪年间的《畿辅通志·星野》，在编排位序、内容撰述与表达的观念、认知上的因袭与创新，不仅能加深我们对这些志书的认识，也可以带给我们一些相关思考。

一 清代《畿辅通志》纂修

编修方志是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到明时期，修一省通志之举在很多地方已较为常见，直隶却是例外。当时的直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北京、天津地区，自元至清其因含国都在内而又有“畿辅”之称。按照《四库全书》的说法，因“畿内之地直隶六部，与诸省州、县各统于布政使司者，体例不侔”，故“诸省皆有通志，而直隶独缺”^②。及清朝统治者因修《大清一统志》之需，康熙年间才有奉命而编的首部《畿辅通志》和雍正年间的再修，三修于同光年间的《畿辅通志》则在方志学界更负盛名。

(一) 奉“上”命而首修的康熙《畿辅通志》和再修的雍正《畿辅通志》

编纂于康熙年间的首部《畿辅通志》，和于雍正年间的再修，皆源于清廷初修《大清一统志》事项的推动。

康熙十一年(1672)，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向皇帝提出由敦促各地编修通志及汇纂《大清一

* 本文为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畿辅通志》局与近代河北地方文化传播”(项目编号:SZ19091)阶段性成果。

① 主要是对光绪《畿辅通志》的纂修概况、体例内容、文献价值等进行梳理、简评，以吕志毅著《〈畿辅通志〉暨〈河北通志稿〉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施墨最多。

②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上册，第606页。

统志》事宜。清圣祖很快采纳这一建议，诏令各省皆编修通志，并以顺治十八年（1661）贾汉复修《河南通志》颁诸天下，作为为各省纂修通志的样本。

康熙十九年（1680）七月，于成龙出任直隶巡抚，并开始奉命主持编修《畿辅通志》，翰林院编修郭棻总其事。康熙二十一年，于迁两江总督，格尔古德继任并续为监修。是年四月，全书告成，共46卷，设星野附祥异、建置沿革、疆域形胜等22门，后人称之为“康熙《畿辅通志》”（以下简称《康熙志》）。《康熙志》是首部直隶省综合性通志，功不可没。但后世多因其实际编纂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仅数月而成书，讨论未为详确”而讥^①，乾隆年间编著《四库全书》时就未将之著录。

雍正三年（1725），清廷因“《一统志》历久未成，特简重臣敦就功役”^②，再组《一统志》馆。六年冬，清世宗明令“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以备《一统志》之采，并提出“务期考据详明，摭采精当，既无缺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③。一为奉命，二因前志之陋，再修《畿辅通志》势在必行。

雍正七年（1729）春，直隶总督唐执玉延聘原任辰州府同知田易等人设局于保定府莲花池，开始采摭重修《畿辅通志》的志料。后来，因直督易人，《畿辅通志》也改由刘于义、李卫先后监修，翰林院侍读学士陈仪承纂修之责。雍正十三年全书完稿，并即行刊印，后人称“雍正《畿辅通志》”（以下简称《雍正志》）。《雍正志》凡120卷，分31目，包括诏谕、宸章、京师、星野、建制沿革、形胜疆域等篇。该志在篇目设置上较《康熙志》更为丰富、内容更为充实，对前者的一些讹误、遗漏也有所厘正、补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加以收录，称其“订伪补阙，较旧志颇为完善”^④。

乾隆八年（1743），《大清一统志》在经历3朝、70余年后告成。这期间，该工程虽几经起伏周折，但直接推动了各地方志纂修，直隶由此改写了无通志的历史。

（二）缘“下请”而作的“方志巨擘”——光绪《畿辅通志》

与奉“上命”而作的《康熙志》《雍正志》不同，光绪《畿辅通志》（以下简称《光绪志》）系“下请”之为。同治十年（1871），直隶总督李鸿章向清穆宗提出三修《畿辅通志》的奏请，称：“溯查《畿辅通志》，成于雍正年间，迄今百四十年。……臣自去年履任，遇有兴除政务，检寻老年卷宗，辄多霉坏；稽之旧志，则纪述疏略，亦不足以备考查。……与司道等筹广义，于保定省城设立总局，延请翰林院编修黄彭年总司其事，遴选朴学员绅襄同纂校，颁发采访条款，分门别类，加意搜罗。……务使巨纲细目，益光圣治，以仰副我皇上体国经野之至意。至志局章程、需用经费，由臣督饬司道，随时筹办。”^⑤言辞间，三修《畿辅通志》的急切之情一览无遗。

李之所请很快得准。是年末，即在保定莲花池书院设局，聘黄彭年为主纂。在前后历经16年、耗资近12万两白银，加以李鸿章权势所能提供的诸多便利支持下，三修《畿辅通志》终于在光绪十二年（1886）大功告成，全书正文共300卷。后人称以“光绪《畿辅通志》”（以

①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一》，上册，第606页。

② 唐执玉：《序》，雍正《畿辅通志》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504册，第12页。

③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一》卷75，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甲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7册，第1122页。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一》，上册，第606页。

⑤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四·奏议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01页。

下简称《光绪志》)。该志分纪、表、略、录、传5篇以统其类,后附以识余和叙传。《光绪志》结构与内容的编排,虽有张裕钊、吴汝纶等人强烈的抗议,但自从刊世以来,其受到的还多是人们的肯定。相对于前两志的门目体来说,《光绪志》的体例安排不仅更便于汇聚和保存资料,易于较全面地反映各种情况,更是客观体现了地方志的地域性等特征。自莲池书局初刊后至今,该志数次被重新刊发,也足见后世对其之看重。《重印〈畿辅通志〉序》称,该志“刊行以后,颇负时望,为畿辅有志以来之所仅见,即在各省通志中亦且推为巨擘也”^①。来新夏认为:“自清初至抗战前,河北省地方志先后纂修五次;但这五种通志中仍当以光绪《畿辅通志》为最善。”^②

二 《畿辅通志》“星野”

3部《畿辅通志》的编修见证了清代方志学的兴盛^③,不同的编修背景又使成书的体例、价值各具特色。如微观至其具体篇章,除学界已有的若干内容校正外^④,还有更多细节可帮助我们深化对这3部文献的认识,如3部《畿辅通志·星野》在编排位序、内容撰述和蕴含其中的观点表达上,前者于后者的因袭与创新。

(一)《康熙志》“星野”篇^⑤

在编排上,《康熙志》的“星野”篇最居要位:以首卷领衔各篇,并后附“祥异”。该志在“卷之第一京师”对城池、坛庙、山陵、苑囿、公署等基本位置做简单介绍,附山水画式的皇城图、畿辅总图、畿辅城郡图、畿辅景图后。该志“卷之第一”即为“图”和“星野”,然后再序以建置沿革、疆域形胜等门。以往史志虽亦多有“星野”之目,但如《康熙志》将其置于首位的安排并不多见。如前述在顺治十八年颁诸天下、令各省当作“蓝本”的贾汉复修《河南通志》,共设30个类目,其“星野”虽也有附“祥异”,但位于图考、建制沿革等篇之后。

《康熙志》何以在沿袭前“范本”志书体例的同时,有意推崇“星野”在全书的席位?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星野是反映政区空间的内容。虽然自宋代开始,就不断有人对传统分野说提出各种质疑和批判,但翻检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大部分仍习惯以星野来表达地方空间。将所志政区纳入星野体系的范畴,是为其在王朝疆域体系中找到合法存在的终极依据;将“地上政区”与“天上星野”相联系,也是为政区寻求在宇宙间的对应位置。如该书将郭棻撰《皇畿赋》放

① 于学忠:《重印〈畿辅通志〉序》,光绪《畿辅通志》卷首,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本,第2页。

② 来新夏:《储料备征的史志巨擘——重印〈畿辅通志〉前言》,《河北学刊》1985年第1期。

③ 乔治忠《〈大清一统志〉的初修与方志学的兴起》(《齐鲁学刊》1997年第1期)认为,清朝初修《大清一统志》直接推动了康熙年间纂修方志的高潮,更激发了地方官、士绅、学者纂修方志的责任感和主动积极精神。

④ 秦进才曾撰文对光绪《畿辅通志》中的个别内容进行辨误,如《清光绪〈畿辅通志·明列传〉人物收录辨误》(《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3期)。

⑤ 以下关于康熙《畿辅通志》的引用文献与内容编排顺序等,皆依自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近卫本”(“阳明文库图书”),卷1,第1—25页。

在“序”后、“凡例”和“修志姓氏”之前，这样少见的编排方式^①，似乎更能得窥修志者的“苦心”：先从“天秩序”确立京师、帝王的尊崇地位，再叙畿辅在“地秩序”中位置，以打造天、地之间无不以帝王为尊的概念体系。

在内容上，《康熙志·星野》开篇引“天官家之言”“治历家之言”，与“汉张衡云帝座有五”，为其随后的叙说奠定“师出有名”的基调，再以“《天文志》曰”提出“尾箕分野为燕，燕之当为帝都也”，结合星域指出畿辅重地的方位，即京师之地与天上的尾箕相对应。随后，从“古皇轩辕氏都涿鹿”，沿溯到“国朝为京师”，说明这一地域有史以来的贵气，以证明“尾箕之野，定鼎者，古今皆在焉，以视八埏九垓，此为裔裔皇皇”。接着，又进一步从天象加以论证，称“今试仰观银汉之天章”，可看到“光华灿烂，由东北而布西南，俯察甸服之地理，博大爽垲，由西南而拱东北于都哉！天心地肺，踞四维八柱之神皋，斗聚星联，启万祀千期之景运，莫此为大”。这些描述无不彰显京师地位尊贵而涂抹上神秘色彩。此后，篇中先图后文，分述直隶地域对应的尾箕分野、室壁分野及昴毕分野，各条再引《周礼·保章氏注》《史记》《汉志》等史书，并下分记北斗所主、天市垣所主、国星所主、五车所主机诸星占验等。最后，附设的“详异”用占全门一半以上的用墨，记录自周至清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二十八日间的一些自然灾害、特殊的天文现象等。如东汉“和帝永元七年^②，赵国易阳地裂”；“（晋武帝）十年六月，蝗”；“元康四年二月，上谷地震，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杀百余人；八年九月，冀豫等五州大水”；“顺帝永建六年，冀州淫雨伤稼”；“嘉靖三十二年春，保定府大饥，人相食，夏大水，人畜溺死无算”等。这些内容大多因袭自各正史，如“秦始皇十七年，赵大饥，地生毛。二十六年，有星陨于东郡，至地为石，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即出自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但其在对一些地震、水灾、旱灾或蝗灾等自然灾害表示关注的同时，又将之与天文现象相联系，透露了人间祸福与星辰变化相关、星象可以推算凶吉的认知态度。如：“永宁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及郡国十二旱。七月，庚申太白犯角亢经房心历尾箕。”此外，文中还记载了一些可附意灾异或祥和的奇异现象。如汉灵帝光和四年（181）秋，“五色大鸟见于新郡，众鸟随之，时以为凤凰”；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博野县麦一本五穗”；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河间“异气”，“四月五日，鼓有气，如火光，龙形，自空至地，直立于西南，数刻方散”；嘉靖九年，“完县下叔村雷击不孝男妇二人”；神宗万历四十年（1612），“新安榆树开花，艳若桃李，是年人大灾”；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大名府大熟，开州产嘉谷一茎四穗”。因此，在文中甚至记有如汉献帝建安九年（204）“秋八月凤凰集石邑县”，与“魏黄（皇）初年清河妇人化鳖入于水”等奇异之说。

（二）《雍正志》的“星野”篇

相较于前者，雍正《畿辅通志·星野》的编排位序有变，在内容撰述上保存了更多的关于星野源流的史料，但在内含的观点上，两者并无二致。

① 吕志毅著（第9页）对将郭棻《皇畿赋》置于“星野”篇也有质疑，认为此操作“实属不当，应归艺文赋类”。不同的是，该著依据“保定知府马兆辰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重印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第4页），称《康熙志》是“将郭棻《皇畿赋》列于星野之后”；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近卫本”（“阳明文库图书”）显示，郭棻《皇畿赋》在星野之前。但无论如何，将“赋”如此前置的做法确实少见，于修志者不可能不知赋文归于“艺文赋”类的常识，郭棻等人此举只能解释为配合“星野”篇对帝王之居的推崇，为皇都的正统地位高唱赞歌。

② 原文“永兴”，但东汉和帝在位期间（88—105）用“永元”年号17年（89年至105年3月），用“元兴”年号9个月（105年4至12月）。故，文中应为“永元”。

《雍正志》的“星野”在卷12。^①但因卷1—6为诏谕，卷7—10是宸章，即皇帝所作诗文，卷11“京师”叙京城各处及盛京形势——将体现皇权地位及意识形态的篇目聚集在一起，置于全志之首以配帝王的特殊地位，而实际与前者凸显王权之尊的用意并无差别，即因袭了《康熙志·星野》借“天秩序”来宣扬帝王封建正统地位的套路。

在内容上，《雍正志·星野》一方面不吝笔墨，大力征引文献，追述星野源流，用字总数近乎《康熙志·星野》的两倍，且其博观约取，指出不同文献的不同说法，以传信为主，求其实用。如其首先记录蔡邕的《月令章句》的一些说法，又紧加按语说，蔡的说法“与皇甫谧《帝王世纪》不合”^②。但另一方面，这些撰述中又承袭前者关于“天秩序”与“地秩序”间存在映射、对应关系的说法，和能占星以卜吉凶的观点：以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观祥妖”开篇；在指出“在天有列宿、在地有州域，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则自古不易之论也”后，依据《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地理志》等所载古代州域或封国及其与天上对应的星宿为基准，确定清代直隶省疆域与古代州域或封国对应的地理位置与范围，进而找出其与天上对应的星宿：“京畿之地，自上谷，涿代以东，北至渔阳，右北平，辽西薄海为幽州。于春秋为燕国，其次析木，其星尾箕。今之顺天、永平、宣化当其地；自涿、中山以西，南至常山、巨鹿、信都、清河、邯郸、平山为冀州，于春秋为晋国，其次大梁，其星昴毕。”在论及天地秩序的对应时，提出尧命“奉天道重人时”，“自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且如“‘春秋内外传’所载，占侯、讖征必验”^③。

（三）《光绪志》的“星野”

相较于前两种，光绪《畿辅通志·星野》因袭最少，而创新最为显著：该志“只以旧术相传，由来已久，略采史传以存梗概”^④，而沿设“星野”；而且，后者在编排位序、内容概述和观点表达上，都明显与前两者不同。

光绪志“星野”不仅没处于志书的显要位置，更甚至没有独立成篇，而是附于卷56“舆地略·疆域图说”的“晷度”篇后。^⑤“晷度”篇源自前乾隆钦定《热河志》中的“晷度类”，主要记录自唐有里度之说以来有关直隶地域测量晷度的成果。附在其后的“星野”也因此而少了些迷信、拥有了些许近代科学的味道。

因对“旧术”之不屑，《光绪志》“星野”在内容上非常惜墨，只摘记了《章句月令》《史记·天官书》《汉书·地理志》《晋书·天文志》和杜佑《通典》及《唐书·天文志》《宋史·天文志》《明史·天文志》《大清一统志》中的寥寥数语，以定畿辅各地之位。这与前两志用力之勤，及其将星野、天象与地上之吉凶相联系的做法，形成强烈反差。

在文末，编者就其如此编排“星野”的缘由做了解释，同时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星野”的看法：

分野之说，昉自周官，历代相沿，其说不一。吉凶占验之论，大抵荒渺不足凭，况疆域有沿革之殊，星次有岁差之别，以古衡今，迥不相合，何足以为信乎？只以旧术相传，由来

① 参见雍正《畿辅通志》卷1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4册，第186—203页。

② 雍正《畿辅通志》卷1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4册，第188页。

③ 雍正《畿辅通志》卷1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4册，第186页。

④ 光绪《畿辅通志》卷56，第2579页。

⑤ 参见光绪《畿辅通志》卷56，第2576—2579页。

已久，略采史传以存梗概。^①

可见，其对以星象占卜灾祥的分野说是质疑和批判的，而之所以仍有该篇目之设置，仅出于存史录志的考虑；在“星野”中借“天上秩序”以推崇地上王权，或以天象占卜吉凶等传统做法，已被摒弃。

三 相关思考

如前所述，有清一代编修的3部《畿辅通志》不仅一改之前直隶无通志的状况，且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给后世留下了了解京畿一带历史的宝贵文献。宏而观之，3部《畿辅通志》在编修背景和成书体例、价值、特色等方面有所不同，微至“星野”篇章的编排、撰述等，前者于后者有因袭、也有创新。如果说，成书于不同时期的志书，会烙有同时代的印痕，是方志时代性特征的一种体现；那么，“星野”在作为旧志常见章节外，还裹杂有若干中国传统观念，使我们在关注这些因袭或创新的同时，可以引发更多的相关思考。

（一）“星野”与若干中国传统观念

“星野”是旧志中非常重要的门类，但在传统的史书中，“星野”所关联的又不仅仅是篇目设置与内容编排问题，它还与中国若干传统观念，如传统中国的史地认知、政治哲学等，有密切关系。^②

首先，旧史志中的“星野”篇设源于古代中国一种古代朴素的地理文化认知，即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州域（邦国）互相对应，可上下观照。《史记·天官书》就有“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之语。^③除“星野”外，文献中又有“分野”“分星”“星土”等不同叫法，杜佑《通典》即称“凡国之分野，上配天象，始于周季”^④。在这一朴素认知的推动下，人们不仅根据地上的区域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州国，甚至还以观察天象来占卜地上州国的吉凶。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周礼·保章氏》即有“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⑤。东汉年间，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历史地理之先河，忠实记录前人这一认知。此后，众地理著述循循相因，一般史志中多以“星野”称之：从天文角度称之为“分星”，从地理角度称“分野”，统称“星野”。

但是，以古代朴素的地理文化认知为基础的天文分野说本身存在着诸多“技术性漏洞”，随着人们理性认知能力的提高，尤其是新史地学观念萌生，这种因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自宋代开始，就不断有人对传统分野说提出各种质疑和批判，并在逐渐形成了一股否定分野的思潮，

① 光绪《畿辅通志》卷56，第2579页。

② 学界对方志中的“星野”（或“分野”）进行专题论述的成果不多，主要有孟凡松的《清代贵州郡县志“星野”叙述中的观念与空间表达》（《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清代贵州方志的星野歧论与政区认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4期）、《空间表达与地域认同——以武陵地区清代方志星野为例》（《文化遗产》2013年第1期）和《晚清知识、观念及其叙事转型——基于贵州五府名志星野志的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这几篇文章主要就贵州及附近地方志书的“星野”在建构地域认同等方面的表达进行探讨，但给笔者以很大启发，在此谨表谢意。

③ 参见《史记》卷27《天官书第五》，中华书局，2011年影印本，第2册，第1248页。

④ 杜佑：《通典》卷172《州郡典二·序目下》，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第4册，第4480页。

⑤ 《周礼注疏》卷26，《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经部》，台北世界书局，1988年影印本，第46册，第31页。

人们对于分野的抨击日益激烈。^① 编修于乾隆年间的《诸城县志》就有言：“总纪不言星变，而为之考，何也？盖天下志乘无不先言星野者矣……谓九州之地足以蔽列宿，故于一邑弹丸之区，亦必求专宿主之于三万里之上，噫！何其小之乎窥天也……”^② 乾嘉以后，分野学说逐渐在一些史志中遭到摒弃，“星野”开始在一些史志书中淡出，被“晷度”等代之。晷度与星野虽非互不相容，甚至二者完全可以分别并存，但分野说的漏洞被发现后，否定星野似乎就成了一种科学思想，是突破旧思想束缚的表现。

再者，旧志书中设置星野或相关内容的门类，其目的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描述，还融会了深刻的政治意义与信仰因素，甚至可以说是统治秩序在志书中的一种投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学说在古代中国人群中有着重要影响，普遍认为，天象是对人的一种警示。因此，先以“星野”定地上州郡的地理位置与范围，再以天象预言吉凶，就成为左右甚至控制人们思想的一种方法、工具。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领域，正是中国古代君主施政过程中对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借用，使“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狭隘化。^③ 分野思想依托于行政区划体系，而西汉以后分野又与行政区划之间逐渐疏离，加上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御用思想工具，故此后将天上的星区与地上的地理区域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的天文分野说，进而实际成为建构信仰秩序系统、维系信仰秩序的象征。因此，在旧志中的“星野”篇中，虽有传统天文学的知识，但更多的是通过天象的“襍祥”来对应地上所及诸国的吉凶。天秩序与地秩序之间的映射对应系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天、地、人”信仰秩序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也逐渐成为古代中国人普遍信奉的一种宇宙观，和古代统治者的一种思想统治工具。

17、18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分野说在知识信仰体系中的权威遭到挑战，一些人开始尝试利用西方先进的知识反省儒学思想体系内相关传统认识。甚至乾隆帝就曾在其《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自注中提到，“盖分野之说，本不足信，而灾祥则更邻于讖纬，皆非正道”^④，表达了其对分野说的质疑。嘉道以还，经世致用思潮再兴，面对曾经的“蛮夷”带给的屈辱，更多中国人开始正视自己与周围的一切，传统的“星野”或“分野”说在这些中国人的著述中的“待遇”也悄然发生变化：从体例安排上看，天文星野在方志中的显要位置受到挑战；从天文星野所志内容上看，具有近代天文学色彩的极度、偏度、晷景等内容逐步挤占各种分野学说的叙述空间。《光绪志》的主修李鸿章虽亦极力维护官方政府的权威性、正统性，但相对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大多数人而言，他属于站在时代前端的“与时俱进”者；主纂黄彭年更可谓“经世派”。他们主动提出三修《畿辅通志》，本为资政之需，分野观念和志书中“星野”显然不在其关注范围内。但同时，他们还不能完全突破旧思想的束缚。由此，便出现了前述之现象：将“星野”附于“晷度”，并斥其荒谬，同时又以“存史料”为由，略记之。《光绪志》“星野”的“尴尬”，是晚清政治思想中特有的一抹色彩。

① 邱靖嘉：《天文分野说之终结——基于传统政治文化嬗变及西学东渐思潮的考察》（《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认为，分野说的技术性漏洞有如分野体系方位淆乱、分野区域广狭不均、地有沿革分野无变等，“分野之说荒诞不经无足取信”，在“南宋至清初可以说还只是少数知识精英先知先觉的思想认识，但到乾嘉以后则变成了社会大众的一种集体共识和普世观念”。

② 宫懋让等修，李文藻等纂：《诸城县志四·星野考》，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第46页。

③ 这也是其后来广受人们批判为“迷信”的重要原因，如《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332页）称：“分野，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的一种概念……分野纯属迷信。”

④ 《御制诗集》第6册，卷1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307册，第8699页。

（二）方志时代性的内在作用与外在张力

如仓修良所言，时代性是方志的特点之一。^① 3部《畿辅通志》的时代性不仅内在作用于每部方志的体例上，更多体现在其内容上、语言文字上，以及编者对一些问题的态度和认知上。透过一部具有明显时代性的方志，我们可以解读志书编纂者和那个成书年代。

编修《康熙志》之时，清军入关不久，需通过星野来强调其以京师为都的原因，并凸显其合法性，甚至用天象的祥异来营造其封建正统地位获取在于得道、是“上天的旨意”。同时，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前，又有自觉与不自觉的仿照、因袭。如清初，李光地曾质疑历来的分野之说，批判其虚幻无稽，“至于眇冥荒忽而莫之诘穷者，则转相祖述而传之以为信，呜呼！其亦与于惑世诬民之尤者欤”^②。当时的康熙帝虽表面上是一位善于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的人，似乎可能摒弃“星野”之虚玄、飘渺的旧说，但实则不然。他向大臣明发谕旨：“古人分野之说，确有所据，后人无阐发者。朕细心推测，方悟其理，故向尔等言之，此又书之可信者也。”^③ 可见，康熙帝虽然对西方传入的一些科技知识有所研习，但局限性颇大，他只是将之套入朱熹理学“格物致知”的框架，并未达到突破传统经史之学框架的程度，其在一些问题上的认识远不及后来的乾隆帝。

雍正年间再修《畿辅通志》时，清政权已较为稳固、经济等方面的实力也堪称道，故除陈陈相因前者的内容、继续宣扬其“王”天下的“合理性”外，这一时期的修志有了更多的在内容上增加资料可能。但是，黄茅白苇，缺乏新意。

至乾隆年间，新的史地学观念已出现在一些时人的视野范围中，包括乾隆帝本人。在占领了新疆等广阔地区，了解了中国之外更大地域之后，面对原来分野之说星空与地面的对应关系，而星宿早已被使用完毕，乾隆帝如何解释自己新开辟和新了解的地区？因此，在前述《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诗自注中否定了分野说后，乾隆帝引发了方志界内一系列的进步现象。如，在其下令改修的《西域图志》中舍弃了“分野”而代以“晷度”；在新修《热河志》中，“删星野之谈天，测斗极之出地，曰晷度”^④；新修《热河志》不仅设“晷度”、舍“分野”，还条列历来史籍对当地分野的说法，加长篇按语予以批驳，以最新的天文、地理知识指出了分野旧说的错误。对此，纂修史官曾说：

盖天象虽虚，而地体则实。据表器之器，精心以求高卑、赢缩，芒忽难淆，理固然也。我皇上学贯天人，识超今古，辟分野拘墟之旧说，而占验讖纬尤灼知其附会难征。臣等仰窥御制《禹贡指南》诗旨，固已旷若发蒙，兹论次承德府诸境极度、晷景，谨为分属排纂。而于分野星次，则略举史传遗闻，而更详辨其不可信，庶俾管窥扣者流，恍然恊载之全量，益钦惟圣知天，非星、史诸家所得仰希万一也。^⑤

言外之意，这些排“晷度”而废“分野”的做法秉承于乾隆帝的学术意旨。对此，乔治忠曾专

① 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104页。

② 李光地：《榕村集》卷20，《规垣宿野之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4册，第571页。

③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4集，卷16，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初七日《谕大学士九卿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册，第2538页。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一》，《钦定热河志》，上册，第604页。

⑤ 《钦定热河志》卷64《晷度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6册，第1923页。

题撰文，表示肯定。他认为，乾隆帝在诗自注中否定分野说后“引起清朝史地学一次科学性跨越”，“带来了传统史地学向科学性跨越的契机”，“在清代史地学发展史与学术思想发展史上都堪称是闪光的一页”^①。

但同时，我们又发现，乾隆帝这一新史地学观念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日后并未能继续光大。这是因为：一方面，保持旧观念以及迷信思想者，任何时代都大有存在；同时，作为皇朝统治者，在涉及统治利益上也会默许旧观念和荒唐思想的存在。如在重修的《盛京通志》中就保留了原来的“分野”门类，以鼓吹清朝先帝屡得“龙兴”符瑞的星象。

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洋务运动时期，西方科学技术和一些思想认知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以天象断地域之吉凶的“星野”逐渐被人所弃。《光绪志》主修李鸿章既站在时代的前沿，力主“洋务”，又因“以志资政”之需而主动提出三修《畿辅通志》。且在其向清廷奏请修志前已经选定由黄彭年主纂，而黄在治学上主张“经世致用”，是“志者政书”的倡导者。因此，在纂修《光绪志》时，资料取舍主要以是否为“资政”所需为参考，“星野”或“分野”显然不在一范围。但同时，另一方面，由于传统儒学积淀的文化具有强大的习惯势力，长期以来强大经学与史学的话语体系已经成为知识人的知识背景，以及方志固有的体例在宋代定型后形成了一种模式，套用这种模式是主流而且便捷的表达方式。所以，当时的志书编纂者徘徊于是不假思索地遵从去因袭这一“模式”，还是遵从新的认知去创新化处理之间。黄彭年在修志体例上的创新当时就遭到一些学者的极力反对，如张裕钊因不同意黄彭年的编纂主张，甚至辞去莲池书院讲席，以示抗议。实际上，不止晚清，甚至民国时期，修史各馆仍有相当数量思想保守的儒者维护分野之类的传统旧说。

此外，客观来说，消除“星野”需要得到表达地理位置的新方法，晷度理念和测绘技术是必要条件之一。康熙至乾隆时期虽然进行过全国性的晷度（大致等于经纬度）勘测，但内地各省一般仅仅一组晷度数据，不足以对峙全国省、府、州县皆有的分野旧说。在史书涉及勘测数据不是很充分的地区，更容易留存分野的记述。乾隆朝之后的许多史籍，特别是各个层次的方志之书仍有“星野”篇设。

今天，透过地方志因陈或创新的“星野”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志书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忠实记载，亦可在志书中窥见时代变迁留下的轨迹。这可以说是方志时代性的内在作用与外在张力。

（作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乔治忠、崔岩：《清代历史地理学的一次科学性跨越——乾隆帝〈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的学术意义》，《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